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成果
【数字民俗文化遺產丛书】董晓萍主编

数字

行业民俗志

SHUZI HANGYE MINSUZH

周锦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成果

【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董晓萍主编

数字 行业民俗志

SHUZI HANGYE MINSUZH

周锦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书总序

董晓萍

中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领域的开基宗师，“中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是其中青年后学团队接续衍生的科研项目，本丛书是该项目成果的组成部分。^①

一、基本思路

现在讨论中国民俗文献史，有两种理念。首先，从历代文献中剥离民俗资料而成史，这是一项不可逾越的基础工作，它主要是由前辈学者完成的。钟先生晚年提出中国民俗学派学说时，已对它的独立意义和学术价值作了总结。20世纪以来，在海外汉学界，已有康德谟(Max Kaltenmark)、谢和耐(Jaques Gernet)、杜德桥(Glen Dudbridge)、欧达伟(R. David Arkush)、石泰安(Rolf A. Stein)和劳格文(John La-

① 中国民俗文献史项目的研究，与另外两个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和“传统行业技术与社会网络”结合进行，法国学者吕敏(Marianne Bujard)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分别为两个项目的法方主持人，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方的主持人。本丛书的几位作者鞠熙、周锦章、舒燕、赖彦斌和吕红峰等先后参加了合作项目，担任研究生助手，并曾得到两位学者的指导，特此说明并致谢。

gerwey)等一批学者,^①研究我国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找到了讨论中国民俗社会和民间小人物的不少好课题,他们都从国际学坛呼应了我国民俗学者的工作,有的还与钟先生有过学术接触。这批中外学者的一大成就,就是在民俗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筚路蓝缕,建立了它的资料系统和一套处理资料的方法,将之变成学问。他们的著作不仅对我国民俗学有启发,也在我国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研究领域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次,按照民俗事象的自身观念和行为系统建史。按照这个理念,学者要对民俗本身的资料形式和内容含义加以描述和研究,而不是仅仅依据历史文献去做民俗史。它不是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前人打地基之后进行工作,前人的成果是它须臾不可忽视的学术史。从资料上说,我国也历来存在着历史文献与口头传统交叉互渗的事实,完全脱离历史文献建民俗史是空谈;从民俗学的方面看,依靠口头传统资料去写民俗文章是可以的,但若建“史”,也还是不科学的做法。本丛书在前期研究和现实准备的基础上,在将两者汇合的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民俗史的概念,主要是以民俗自身的观念、解释、结构、分类和功能系统为主体,在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下,审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和现实田野作业中的民俗记录两者,建设以民俗学研究目标为主的、历史文献与民俗志相结合的民俗史。它区别于次生于历史文献的民俗史,也区别于单纯强调口头传统的民俗史。它在新理念的框架下,根据我国实际,将文献与口头资料综合起来建史,故称“民俗文献史”。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尝试解决三个问题,以使这一研究形成完整思路。

第一,分期与分类。建史,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分期。但是,从原则上说,民俗是不能按照历史文献的分期法去分期的。所谓唐代的民俗不等于隋代没有,老百姓也不是按照历史朝代去考虑该不该传承包饺子和祭祖宗的民俗的。给民俗事象做历史分期是学者的想像,它能满足于学者的书面阅读习惯和传统治学方法,却不适合于在人生文化和社会整合中代代传递的民俗。民俗是一种对人类利用自然和文化的观念与行为产生连续影响的人文现象,是连续同一体文化,历史性是它获得学术权威性的策略,它在本质上又是日常形式的动

^①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献并涉及中国民俗资料的,例如:[英]杜德桥(Glen Dudbridge)《妙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 London: Ithaca Press, 1978。[美]欧达伟(R. David Arkush)《中国民众思想史论》,董晓萍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法]龙巴尔(Denys Lombard)、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二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6。

态文化，以传统而时尚的方式传承，所以才能代代抓人，这与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追求的静态文化性质不同。与民俗史不同的是，民俗学史的研究可以分期，但这种分期也是要极其谨慎的，要建立使用历史文献的原则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否则就会假学者之手，把民俗的形式和本质给割裂了。从前从历史文献中剥离民俗的某些做法，把民俗变成了静态历史，也殃及民俗学史。在本次研究中，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并不忽略民俗学史的历史遗产，但在建设民俗史中，主要在从历史文献中钩稽民俗记载时，还做到补充和完善以下三点：①列出围绕被认定民俗要籍的其他文献要目，包括反映社会上下文的文献，以及文学、农学、哲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史料，形成整体文献系统；②补充历史上已形成的民俗文体文献，如“风土记”、“岁时记”、“志怪”笔记、“水利簿”、“人物志”、“竹枝词”和“俚言解”等，按照这种民俗文体的原有分类，进行跨历史的纵向归纳、描述和分析；③将以上两种文献综合观察，描述和分析我国民俗文献的形成方式、文献化过程、解释价值和社会功能。再按民俗分类，并根据现代民俗学的基本问题，设题成史。以往的民俗史已有通史或断代史，但它们缺乏对分期和分类的异同的认识和讨论，没有建立搜集、使用历史文献和民俗文体文献的各自原则和综合分析方法，缺乏对社会上下文和相关学科史料的交代，这是不够的。本次研究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改进。

第二，恢复民俗社会研究目标。做我国的民俗文献史，需要有比较明确的学术目标，不能为民俗而民俗，或为文献史而文献史。没有学术目标的建史，即便另有想法，也不会对学术发展真正有所增益。本次研究是要恢复一个民俗社会的结构框架，讨论在民俗社会的结构中民俗文献的内涵和价值，而这正是从历史上到现在的学者都关心的问题。进一步说，我们要尝试解释民俗文献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在民俗社会中历史文献被使用的意义，口头传统与文字文化的复杂关系，民俗被地方文献化的过程和利用途径等。我们还试图说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人、事原型，与民俗文献中的自然、人和社会的原型，以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人、事与自然风物资料三者的关系等。总之，通过这类努力，揭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文献文化现象，指出民俗文献的生命力。

第三，避免海量信息垃圾。在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下研究民俗文献史，不仅有历史文献和口头资料两个庞大系统，还要对它们的分类方法、使用原则、描述逻辑进行分析、从资料中提取民众知识专题库，所获信息是海量的。如果不控制信息容量而上手开工，项目结项就是天方夜谭。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计算机的数据库技术和GIS技术等给我们帮了大忙。本项目的全称是“中

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其中后半句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含义指此。数字化可以促成更优胜的分类逻辑和储存理念，不仅能给信息文本减肥，还能给学者节省大量的时间，加快研究进度，并能将预期成果在数字运行环境下演示再现，形成新的研究平台，好处不少。当然，要使这种理工科技术在文科使用得当，还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探索。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就做了其他两个相关的项目，以寻找“民俗文献史”与“数字化系统管理”的最佳结合点：一是针对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辑录作数字化，目前已从历代地方志切入，搜集传统节日史料，建立节日民俗文献数据库；一是针对民俗文献和口头传统中都稳定存在的故事记录作数字化，重点从20世纪钟敬文先生等前辈的故事研究著述和使用资料切入，建成中国故事集成县卷本基本词数据库；现在这两个项目的完成，都为本丛书的整体成型支付了成本，也作了必要的积累。事实证明，只要文本研究扎实，再借助数字化，数字化就能给文本研究插上翅膀。

二、突破点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研究和数字化管理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一些难题，可以促进现代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及应用研究。

在理念上，钟敬文先生所倡建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是本次研究的重要支撑，但这个草图还需要后学去充填。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我国民俗文献史的系统搜集、整理、研究，扩大了以往民俗史的研究领域，还可以为加强民俗学史的建设打底。这有助于进一步发展钟先生的学术设想，丰富中国民俗学派的内涵。在本丛书中，《数字钟敬文工作站》一书对此作了详细阐释。

在体例上，以往民俗学界做民俗史，主要根据文人文字记录对民俗史料作分期、分类和分门别类的解释。中国民俗文献史突破了这一模式，引入了民俗文献的概念，根据民俗文献被民众理解和民俗社会应用的实际，作重新分类和学术解释。另一方面，本次研究也指出，在民俗记载上，文字文献与民俗文献之间具有共同点，也有差异面和多层次的区分，在新的分类体例下，对它们可以作更精细的研究。

在资料上，本次研究有三个关注点。首先，历史上的文人文献有对民俗的情感、直觉和“当时性”的描绘，并累世汇集成了由无数个“当时性”片段组成的地方史，在后入无法对历史民俗现象作田野调查之处，它们都成为后入认识民俗史的第一手资料，这点是与上层正史不同的。在研究和撰写中国民俗文献史中，我们指出，任何文献都是识字阶层参与的结果，因此需要指出历史上的文人观念和现代学者观念对造成民俗文献的作用。我们还应力求对上述资料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批评，以说明中国民俗文献被记录和保存的内在规律，探求民俗文献形成和流传的本质。其次，对有些民俗文献，如有条件作田野作业，

可以开展田野调查，这样往往会得到其他收获，至少可以看到现实社会中历史文献被保存下来的民俗观念的传承变迁和现实应用活动，有利于将文字中看不到的民俗含义揭示出来。再次，对民俗社会的口头传统资料也要保持距离。它们固然传达了民俗信息，但也要看到它们受到地方化过程的限制，又被选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解释，以及由此发生的变化；要指出它们在地方运作的鲜活资料，帮助读者看到民俗文献能“活”下去的理由。本丛书基于上述思考，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这种工作迄今少见。

三、方法与方案

本丛书对以往民俗学的方法论扬长避短，在新理念的指导下，采用了民俗分类、整体观照和数字管理的新方法开展工作；在方案上，采用“建库”、“建志”和“建个案”的三步并综合进行。

“建库”，指“建学术史库”。在各子课题中，对该子课题所涉及的前辈学者研究问题和前人所使用的资料，尽可能地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前人没有从本次研究的角度作工作，故各子课题所实际涉及的资料其实并不是过多的，而是可以被控制的。同时，各子课题也注意国际同行对相关民俗文献的主要理论争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并在这一部分中，有所对话或讨论。

“建志”，指“建民俗文献志”，或子课题所研究的“民俗志分类专题库”。它包括在该分类事象上的历史文献记载、口述史、民间碑刻、民间行业、民间技术会章和民间社会组织史料等，作者要将它们建成大体完整的专题民俗志系统。在这方面，还要考虑我国民俗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元性，所以该库的范围要限定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内。在描述和研究上，还要与相关学术史问题进行观照。例如，在《数字行业民俗志》一书中，就对传统手工行业的民俗文献和现代传承的基本问题作了研究。

“建个案”，指各子课题在对田野个案点的调研基础上，完成资料系统的建设和研究。个案点的选择，应该是将学术史、民俗分类专题库和田野作业资料贯穿起来的地点。当然，不是所有学术史上讨论的历史文献都能找到对应的个案，也不是所有民俗分类专题库的资料都要作田野调查，更不是现在热闹的民俗地点就适合成为个案。本丛书所选择的个案点是历史成就、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的统一体。例如，在《数字碑刻民俗志》中，便根据明清碑刻铭文的线索，对照民俗分类调查资料，同时根据地方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俗遗产地点，确定了猪行、纸行等个案。

在理论呈现上，本次主要开发了WebGIS自带数据库，辅助民俗的文献储存、管理和研究。在各册书的撰写中，还都增加了数字辞典，也有的编制了

数字民俗地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仅以数字辞典为例，由于民俗文献史的内容涉及面广、文献保存介质复杂、学术史问题多、个案时间跨度大和民间用语极为丰富等，在撰写著作中，很容易出现驾驭失控、成果散包，或者失去目标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我们在每本书中都做了数字辞典，附在书后，供读者查询。数字辞典的功能有三：一是管理各书及其子课题的民俗文献编制目录、搜索引擎和民俗分类表述系统；二是介绍各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专业术语、历史文献提要、民间用语的含义，防止因子课题中的历史词语、现代概念、项目术语和民间语汇混合共用，所可能出现的歧义纷纭的弊病，也避免将不同性质、不同时期和不同介质的文献放在一起讨论，所可能产生的概念交叉和理论界定不统一的毛病；三是说明各书的资料和理论的整体结构系统和研究方法。各书的数字辞典数量不一，视研究内容而定，如在《数字钟敬文工作站》中，附有三个数字辞典，即中文版辞典、英文版辞典和书库数字辞典，在《数字碑刻民俗志》和《数字行业民俗志》等其他著作中，也各有一个数字辞典。^①

四、成果要目

本丛书是综合性系列著作，总称“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它们在成果性质上，都是中国民俗文献史研究的分类著作；在成果形式上，都是纸介著作、田野报告和数字辞典(或数字民俗地图)的三合一，整体成史。

还有一部分民俗文献史的子课题，侧重学术史上的基本问题，研究专题民俗文献史。但它们不是做以往民俗史上的断代史或通史，而是尝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梳理前人工作，补充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民俗文献，辅以口述史访谈和数据库，形成独立成果，例如：《抗日战争和稍后时期的民俗文献史：1937—1949》，^② 以及《建国初十年民俗文献史：1949—1959》，^③ 其他专题民俗文献史著作也将陆续完成。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研究目前还只是“纲要”，后面还有很多科研工作要做。但仅就已完成的成果看，它的意义是明显的：在理论上，它能使学界同行和国人对我国民俗文献之博大精深增加认识；在社会环境上，它从调查、研究到撰写，都已不可避免地我国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建设发生联系，这些背景给我们以激情和后劲。

① 本丛书的《数字碑刻民俗志》和《数字行业民俗志》两册在出版时，限于字数，其数字辞典原文未刊，将另行出版，但这两册书都保留了数字辞典的方法讨论和方案设计内容，以保持成果的完整性。

② 庞建春：《抗日战争和稍后时期的民俗文献史：1937—1949》，打印稿，2005。

③ 黎敏：《建国初十年民俗文献史：1949—195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民国时期北京手工业分布、分类与民俗传承	25
第一节 清末和民国时期北京城市转型中手工行业的位置	26
第二节 民国北京手工行业的技术民俗	52
第三节 民国北京手工行业的经济民俗	67
第二章 民国北京手工行业产销习俗个案研究	94
第一节 铜器作坊与北京礼俗社会	95
第二节 民国北京刀剪业的生产运作与销售民俗	115
第三节 民国北京玉器业的生产运作与民俗	140
第三章 北京手工行业民俗与市民基层社会 ...	168
第一节 手工业与民俗社会关系网络	169
第二节 市民基层社会文化模式：手工行业与胡同社会的关系	183
第三节 劳动力资源与就业观念	205

第四章 北京手工业民俗志数据的处理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44

后 记 255

插图目录

图 1 北京手工业民俗志调查地点示意图 258

图 2 清末至民国时期(1900—1949 年)北京玉器业市场分布示意图
..... 259

图 3 民国时期(1911—1949 年)雍和宫附近铜器作坊分布示意图 ... 260

图 4 民国时期(1911—1949 年)打磨厂地区刀剪店分布示意图 261

绪 论

本书重点考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城市手工业民俗志。主要以北京城市手工业民俗为个案，从现代民俗学和社会学相交叉的角度，在北京传统封建政体和新民族国家政府生死交替之际，在北京传统帝都城市向现代进程转型的重大历史时刻，以19世纪末至1949年为时间段，以北京传统城市和现代进程中的城市生活都有日常需求的城市手工业人群为对象，从手工业行业组织传承和社会网络的关系切入，同时也在这一侧面上深入搜集资料 and 开展研究，探索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重构中，手工行业民俗的位置和作用，包括这种半工半农、半城半乡的城市基层民间组织对北京城市重构的民俗合理性，手工业初级技术人口对北京城市重构初期现代风气的大众适应性、工匠行会组织民俗转为同业公会或部门工会在城市劳资经济初建时期的再价值化能量和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意义等^①。由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学术分野，这些问题两个学科从前都很少讨论，但其历史文献和口传资料都相当丰富。本书辅以采用计算机应用科学的数据库理论和方法，加强对这方面大量资料的处理和分析，包括北京明清方志杂纂中的行业文献、行业碑刻、1949年前后至1956年北京手工业工商改造期间的行业档案和田野资料，及其数字数据。在前期参与项目组工作的基础上，本书选择北京铜器业、剪刀业和玉器业三个从北京传统到现代时期都在经营的行业为分析样本，开展深入调研，同时也借助数据库的优势，与同时期其他手工行业的数据做对比分析和综合分析，本书重点提出重视城市行业民俗的良性发展对降低城市社会发展人文成本的观点，旨在促进现代民俗学的城市社会研究，也补充现代社会学的民俗文化研究。

^① 根据本书的学术目标，主要使用现代民俗学和社会学理论，讨论1949年以前的北京手工业资料。在理论范围内，采用现代学术视角，以北京研究史为对象进行研究。但在资料范围内，北京多次更名（清末民初至1927年称为“京师”或者“北京市”，1927年至1937年改称“北平市”，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恢复“北京市”的叫法，1945年抗战结束后直至1949年再次称为“北平市”。）使得在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上，要增加频繁的说明文字，而这不是本书的主旨。为了方便运用理论讨论资料，同时也为了方便阅读，姑且在本书的正文中，统称“北京”；但在资料出处上，一律遵从资料原文中对北京的历史称谓，不做任何改动。特此说明。

一、基本概念与题解

城市手工业民俗志，主要是考察在传统城市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手工行业的民俗传承方式和结构转型。重点研究手工业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利用原有的城市基层市民组织和传统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吸收城市基层民俗社会的各种资源，形成独特的结构性运行机制，既维持社会生活稳定，同时发挥缓冲社会压力和节约变迁成本的文化价值。

在理论建构上，本书以手工业的民俗传承为考察对象，将其放置在民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语境中认识，研究城市社会中行业发展的民俗结构方式，并对行业民俗传统对民国城市社会良性运行的作用重新进行理论阐释。现代社会变迁对城市社会人际关系内容及其组织的影响如何，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理论家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有关社区与社会的对立、涂尔干(Durkheim Emile)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分、韦伯(Max Weber)有关城市市场交换中人的理性以及社会组织科层化的论说，都显示出“社区”(community)向“社会”(society)转化过程中城市与城市基层市民组织的紧张关系。^① 上述理论将焦点放在传统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上，试图探如何讨解决城市社会中大量异质人群的团结感，以确立群体联合的社会作用，并进一步寻求形成城市共同体的办法。而费孝通吸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的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② 本书主要从民俗文化入手补充上述研究，通过阐释手工业在民国城市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这种摇摆于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城市基层民间组织，如何利用行业知识传承和城市基层社会多元民俗共同体的网络结构，缓解现代化和转型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适应城市变迁初期的现代风气。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围绕以下三点进行理论建构：首先，民国以来，北京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巨大压力，传统工商行业成了城市传统与现代进程的冲突和认同的一种社会资源。为了保证集体利益在相应社会关系中的控制权力，工商

^① 涂尔干(Owr Kheim Emile)，在其他译著中也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根据1948年上海观察社第1版重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美]欧达伟(R. David Arkush)：《费孝通传》，董天民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业群体在传承过程中利用北京民俗社会的特点，吸纳大量的底层流动人口，并因此确立了自身的社会身份和文化权力，同时也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之一；其次，城市手工行业的内外部运作十分活跃，流动性强，通过与城市基层多民族民俗社会的文化融合，往往具有技术交流、经济合作和民俗认同的特征，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社会控制和群体利益都相互适应的多元民俗共同体；最后，城市社会的民俗生活是手工行业社会运行的重要文化资源，它决定了行业群体的行为方式、世界观、情感世界和价值体系，左右着城市传统手工行业的结构类型和发展取向。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各种社会群体的就业机会，保护共同的社会利益，而且是急剧社会变迁的缓冲器，并由此确立了手工业者的社会身份。

在方法论上，本书主要采用民俗志的研究方法，并非单纯整理和叙述手工业民俗资料，而是在上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计算机应用科学结合的角度，阐述行业文化的传承方式及其在城市基层社会结构中的作用。^①在项目组的共同工作中，本书首次建立了北京手工行业民俗史基础数据系统，整理清末至民国北京各种形式的行业民俗史料，同时重点对三个样本开展田野调查，对历史文献与民众生活的联系进行重新阐释或补充解释，撰写了北京城市手工业的民俗志；而且初步进行数字手工业民俗研究成果的创新研究，利用数据库和数字地图等技术，在人文研究的基础上，制成北京手工业志数字辞典、北京行业文化和专业技术的传承数据库、北京传统行业档案数字地图及北京传统手工业田野调查经济地图等，并运用数字民俗学的新方法开展多元视角的分析，展示手工业民俗的文化脉络。^②

① 关于民俗志的界定，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提出：“它的性质是记录的，不是理论的。当然，就是记录资料，也要用理论的思维去安排和叙述，使民俗志的写作达到再现民众文化的目标。”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47~48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② 本书所利用的手工业文献和民俗数据库，在项目总方案设计和学术观点上，由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和法国学者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主持并指导，我本人担任项目组的数据库制作组组长，本项目组的其他成员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吕红峰和2006级硕士研究生连莉。具体分工是：数据库技术设计：周锦章；行业档案查询与工作报告：周锦章、吕红峰和连莉；行业档案查询与录入：周锦章、吕红峰和连莉；行业档案数字地图绘制：吕红峰和连莉。

二、研究的意义

本项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首次从手工行业民俗的侧面，做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就近年社会学关注的问题而言，在城市社会学上，主要研究城市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并探寻解决对策。社会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侧重于利用某种理论框架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社会问题或社会政策等进行描述、分析及评价，从而提出对策或解决办法，其长处在于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系统地搜集资料并进行定量研究，善于把握个体与全局、经验与结构的辩证关系。民俗学作为社会学框架下的学科之一，与之展开对话并进行交叉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民俗学本身的传统优势，是与本民族的中下层基础文化和现代变迁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善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恢复构建民众生活知识和生活传统。在近年的关注问题上，民俗学转向城市，包括城市历史街区民俗研究、城市市民信仰传统研究、城市用水民俗研究等，但对民俗传统与城市社会现实运行的关系研究尚较少涉及。若以此为切入点，从微观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中去提炼社会理论，就能使之更为充实、更具说服力，有助于从学术上分别建立资料系统和理论体系。本书研究的民国北京手工行业，曾经是民国时期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调查完成，采用定量研究的办法，对当时手工业者的日常社会生活进行分析，以了解、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推动社会改良为主旨。本书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辅助部分统计数据，通过勾勒出民国北京手工行业的历史变迁，对该行业发展的传统动力进行多元视角的阐释，补充社会学研究中过于注重社会现实的单一维度。而且，从研究利用的资料看，本书将大量使用档案馆所藏的民国以来北京的行业公会、工商税务及户口档案文献，这些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常常受到忽视。而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城市手工业民俗事象的研究中，主要从民俗类型学的角度出发，采用文本证明文本，或用文本对接历史的办法，缺乏有效的说服力。在这方面，社会学有独特的办法。手工业民俗志试图借鉴了社会学的下列部分：城市社会研究、社区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和定量定性研究，通过将上述概念或方法与民俗文化的类型研究相结合，勾勒出民国城市手工行业的社会变迁，从立体的角度对该行业发展的社会动力进行诠释。如此一来，不仅可以验证手工业城市基层传承模式的社会存在，得到社会上下文的支持，从而揭示其与城市基层社会的密切关系，而且通过对具体民俗文化事象类型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也开拓了社会史中的下层史研究。

第二，首次建立手工行业民俗史基础数据系统，增强研究成果的社会现实应用性。

民俗学重视资料的价值，民俗志的概念本身就包括民俗资料，和使用这种资料的原则、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而民俗资料学，也是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派学科体系构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俗学的资料纷繁复杂，如何妥善保存、管理，使之能被利用和二次开发，是民俗学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在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下，利用数字化手段表达人文学科的研究，是通过数据集成和数字环境运行的方式，形成、展示乃至共享研究成果。本书认为，利用数据库手段保存手工业民俗资料，表面上是对资料的数字化管理，实际上也是在探索手工业民俗的内部文化逻辑，从文献和田野两方面对传统城市手工业的文化意义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关的人文分类标准。而且，在民俗志分类和属性描述的基础上，可以对手工业的民俗志内涵进行归纳、联系和整合，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研究效率，从而拓展民俗学科的发展空间。北京手工行业民俗史基础数据系统即是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民俗学专题典藏类的数字化成果，它通过民俗学与社会学、地理学和计算机应用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创建了一个以数据库为形式的，较为完备的综合人文分析研究新平台，有利于摆脱民俗学研究囿于思辨而无法实证的困境，是一种技术兼观点型的新方法。

第三，尝试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学术支撑。

本书的研究对象之一北京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多项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手工艺在北京手工行业史中与宫廷生活息息相关，其艺术含量最高，工艺难度最大，但是由于古代工匠地位低微，史料上对他们的工艺活动记载甚少，历史上流传至今的诸多手工艺品也均无年款和名款，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再加上如今产品、人才、技艺日益衰落，北京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亟须保护。本书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正是要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探讨北京行业和工匠商贾的传统经济、文化和技术民俗，重新阐释行业的历史文化资源，将祖先创造的民俗文化再度价值化，展示其作为北京独特文化传统载体的风貌和魅力，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特征来看，必然会对现在和将来的北京文化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既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支撑，同时民俗学研究也需要补充世界遗产学的现代知识框架和行动框架，去更好地发挥学科作用。因此，北京手工行业的研究，希望在关注行业民俗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同时，增加对传统工艺传人培养、传统工艺加工与民俗环境保护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从历史传统的角度展示北京作为现代国际化

大都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总之，本书将行业史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究民国城市手工行业民俗传承与城市基层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及特征，在研究内容、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可以对以往研究做出某种程度的补充和发展。

三、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19世纪以来，欧洲民俗学界，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芬兰等国家，都有研究物质文化的传统，其中包括手工业民俗。但早期民俗学者主要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诠释物质文化的内涵，如英国民俗学者班恩(Charlotte Sophia Bume)在《民俗学手册》中提到：“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犁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使用者的社会生活。”^①这一学说对早期的中国民俗学界的影响较大，在涉及手工业研究时，民俗学家倾向于分析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精神内涵，缺乏对经济要素和生产技术等物质要素的讨论，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精神文化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钟敬文和其他民俗学者的推动下，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的拓展，突出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深化。钟敬文曾关注对物质民俗的研究，他在《民俗文化学发凡》中指出：“物质文化，一般包括它的各种品类及其生产活动两个方面，以及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的。”^②这句话强调了物质文化不仅有文化观念方面的传承，还包含了物质和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而手工业作为物质民俗之一，在《民俗学概论》中，依据从业群体的文化特征，著者称之为“工匠民俗”，是传统物质生产民俗的主要形式之一，该书从工匠的技艺传承、工匠的行业习俗和工匠民俗的特点三个方面介绍了手工行业民俗的概念和相关知识。^③同时，在商业民俗、交通民俗、节日民俗、饮食民俗和精神民俗的描述中，也涉及不少手工行业的特征。华觉明等科学史学者则从民间科学技术的角度，探讨了传统技术史中民间科技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地

① [英]班恩(Charlotte Sophia Bume):《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②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收入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③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56~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位。总的来说，上述民俗学界对手工业民俗的研究，是从民俗资料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且集中于描述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事象，对于物质文化的传承和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关系，较少进行探讨，相关资料也缺乏梳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从总体上把握手工业民俗社会，还必须了解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城市社会进行研究时，分析材料和构建理论框架的方法。总之，本书不仅要吸收已有的城市手工业民俗研究的成果，还要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以及城市民俗社会的讨论中借鉴相关的理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对城市手工业的研究上，中外学者对此做过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果。民俗学界对于城市手工业民俗的研究，主要以梳理行业民俗事象的资料学为主，抑或从民众精神信仰的角度出发，以静态的文本分析手工业的祖师崇拜及其文化意义，未能将行业运转与城市物质生活结合起来进行有机的思考。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虽然注意到手工行业在民国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学科训练和学术目标所规定，比较侧重从书面文献入手，对城市生活历史变迁进行整体描述和分析，缺乏与当地民众建立相应的田野关系，因此未能从民众生活的微观角度挖掘手工行业的民间内涵。而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其主旨主要是展现民国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寻求解决对策，所以在分析资料时，市民基层社会传统的特殊价值和文化经验往往无法得到深入的呈现和阐释。但总的说来，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本书的进一步思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就是在史料上所作的深入挖掘，鉴于有关民间生活的记载很少见于官私史籍，所以对历史档案、碑刻资料、地契房契等史料的开拓，便使研究视野得到扩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典籍范围；其次是研究视角的新颖，在关注国家政治与城市社会关系的同时，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下层社会的民间传统；再有就是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丰富了对城市行业历史变迁的认识。

考察这类课题的相关学术史，大致可分为四条线索：一是城市民俗的研究，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或通过田野调查，探讨城市社会的民俗文化类型，其中包含丰富的手工业民俗资料；二是城市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其基本方法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实地考察城市手工业者的各种社会生活或技术传承；三是手工业社会组织的研究，其基本方法是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出发，通过会馆、行会或同业公会等讨论城市手工业的城市基层市民组织；四是民国城市社会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探寻民国中国传统城市的变迁动力。本书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城区为考察个案，从现代民俗学和社会学相交叉的角度，探索在